

【中国古代】

散文

名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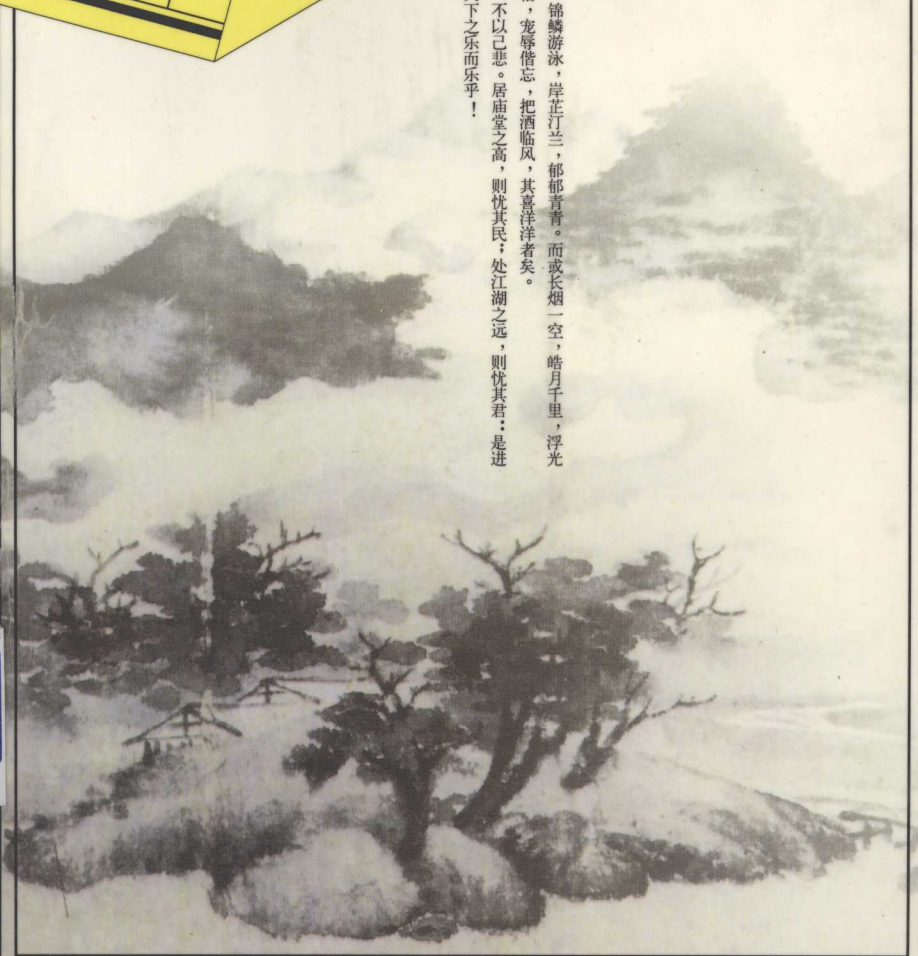
顾亦然
任闻杰

选注

散文名

■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中国古代】

散文

名篇

顾亦然
任闻杰

选注

散文

文

选注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散文名篇/顾亦然,任闻杰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8

ISBN 7-02-003093-9

I. 中… II. ①顾…②任… III. 古典散文-中国-选集
IV. I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2520 号

责任编辑:马玉梅

责任印制:李 博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8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插页 2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10000

定价 20.00 元

前言

我国是诗歌的王国，同时也是散文的王国，散文的传世之作，其数量之大，简直浩如烟海。我国的散文，源远流长，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作者，直到今天，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思想与艺术方面，都有可资继承和借鉴的地方。

我国的散文，形成、成熟于先秦时期。殷代的甲骨卜辞，商、周的铜器铭文，多数为片言只语，少数能较明确地表达一个中心意思，还不具有结构严谨的篇章，这是散文的萌芽时期。而《尚书》的出现，标志着古代散文已经形成，其中有比较完整的论说文和记叙文。

《尚书》之后，散文分别向着偏重于论说的诸子散文和偏重于记叙的历史散文两方面发展。

从春秋末年开，奴隶制逐步为封建制所代替，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时王纲解体，礼崩乐坏，由“学在王官”一变而为“学在民间”，出现了活跃在社会上的“士”阶层，他们代表着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针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发表这样那样的评论，提出各自的主张，于是出现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又加游说之士纵横驰骋，各类文章，尤其是论说之文，获得长足的发展。诸子各家，著述繁多，儒家有《论语》、《孟子》、《荀子》，道家有《老子》、《庄子》，墨家有《墨子》，法家有《商君书》、《韩非子》，杂

家有《吕氏春秋》。《论语》是语录体的散文。到了战国中期，语录体散文仍很流行，《孟子》、《墨子》、《庄子》中的一部分都是。但《孟子》等比起《论语》已有所发展，他们所记已不是单人的语录，而普遍采用了对话的形式。如《孟子》一书多记论辩之辞，每章围绕一个中心展开，带有驳论的性质。《墨子》、《庄子》的某些篇章也相类似，通过论辩，对论题阐发得更加详尽，从此促进了散文形式的发展。《庄子》与《孟子》，体现了对话语录体散文向专题论说散文的转化。到了战国后期，《荀子》、《韩非子》等书，则完全摆脱了语录对话体，成为专题论说文，它们的大多数篇章，都写得中心明确，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论证充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标志着先秦论说文的完全成熟。

先秦诸子散文文学性很强，大多注意文采，并使用比喻、排比、夸张、映衬等多种修辞手段。《庄子》、《韩非子》尤重运用寓言，从而使他们的论说文大大增添了形象性和文学特色。

先秦诸子散文在先秦的文学园地中可谓各放异彩，《论语》言简意赅，富哲理，多警句、格言；《墨子》讲究逻辑，善于运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例作论据，多用类推法，虽然比较质朴，但文章却浅白而结构严谨；《庄子》汪洋恣肆，想象奇特，像《逍遥游》那样的名篇，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是不可多得的。《荀子》论证缜密，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托喻设譬，十分精当。《韩非子》犀利峻峭，分析入微。难怪秦始皇见韩非子的《孤愤》、《五蠹》之书，感叹地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荀卿韩非列传》）

与先秦诸子散文大体同步发展起来的，是先秦历史散

文。编年体的《左传》，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是其代表。《左传》以《春秋》简略的记事为纲，具体地记述了春秋时代的历史事件，尤以叙写战争描写人物见长。本书所选的《郑伯克段于鄢》、《曹刿论战》可见其一斑。《古文观止》开篇即选了《郑伯克段于鄢》。“此篇写姜氏好恶之昏僻，叔段之贪痴，祭仲之深稳，公子吕之迫切，庄公之奸狠，颖考叔之敏妙，情状一一如见。”（魏禧《左传经世钞》卷一）

《国语》长于记言，比起长于叙事写人的《左传》在艺术上略逊一筹，但亦有较精彩的篇章。

《战国策》长于铺叙，且多记纵横家的言行。其叙事更连贯、更集中，写人物往往能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使人物的精神面貌鲜明而富有个性化的特点。

秦代是个短暂的时代，又实行过“焚书坑儒”等文化专制政策，散文未获得多少发展，略可称道者，不过李斯《谏逐客书》一篇而已。

西汉时期的散文，是沿着先秦散文的方向发展的。贾谊、晁错的政论文，直接继承的是先秦诸子论说文的传统，像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指陈形势，分析利害，向以“疏直剴切”著称，是参政、议政、干预政治的产物。他们虽然不是“处士”，而是西汉帝国的官吏，但继承的是处士议政的传统。他们的政论文与当时的政治关系极为密切，都是服务于政治的，其立意是为西汉帝国求得长治久安的。

西汉时代，国力比较富强，反映帝国强大脚步声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和铺张扬厉、雍容典雅的汉代辞赋（汉大赋）。从广义的角度说，散体的大赋也是文，中国古代散文史专家

郭预衡先生说：“中国古代的散文，一般说来，即是前人之所谓‘古文’，但也包括与古文相对的‘骈文’。中国的骈文，乃是汉语文章一种特殊的结构形式。骈辞俪句，却不同于诗词。曰‘骈’曰‘古’，都是散文。骈四俪六，只是汉语文章向偶俪句式发展的一个极端。但物极必反，古文运动之废‘骈’复‘古’，就是文章句式又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国古代的散文，不但包括骈体，而且包括赋体。古来的辞赋，本来介乎诗文之间，虽然有人说赋是‘古诗之流’，但有些辞赋不近于诗而近于文。有些古文选本，不仅包括骈文，而且包括辞赋。反之，一些诗歌选本，却没有包括辞赋的。……总之，中国古代的散文，和今天之所谓散文的概念，有所不同，古代散文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古代散文百科大辞典·序》）散文不仅包括骈体，也包括赋体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中国的文学语言，骈散结合的形式，在先秦时代就存在，正因为如此，所以姜书阁先生的《骈文史论》将骈偶文学追溯到先秦时代。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代文学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一代文体的发展，既受前代文体的影响，同时文体之间也互受影响。拿汉赋来说，它不是凭空产生的一种文体。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云：“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诗经》中有“六义”之说，指“风、赋、比、兴、雅、颂”。这里的赋，本指一种表现手法，简言之即铺叙手法，用刘勰的话说，就是“铺采摘文”，即铺张文采。这种手法，诗歌中可以用，散文中也可以用。

写文章以赋名篇，始于《荀子》，《荀子》有《赋》篇，分咏《礼》、《智》、《云》、《蚕》、《箴》。屈原的《楚辞》，虽被后人称

为“屈赋”、“骚赋”，但尚未以赋名篇。屈原之后，宋玉有《风赋》、《钓赋》，才开始以赋名篇。汉代的大赋是从《楚辞》发展而来，而“赋”这个词的来源，是《诗经》作者命名的，所以刘勰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汉代的辞赋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而且散韵结合，骈散结合，虽介乎诗文之间，但更接近于文。汉赋比起《楚辞》来，在体制上更加解放，也更加接近散文，这种现象，可以称作“辞赋的散文化”。《庄子》的散文已有“散文辞赋化”的倾向，而屈原的《楚辞》却具有“辞赋诗歌化”的倾向。《庄子》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正是散文辞赋化的表现，而“辞赋的散文化”不仅影响到日后的散文（主要指骈文）的写作，也影响到诗歌的创作。各种文体的交互影响，在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先秦的历史散文，发展至汉代，出现了纪传体的《史记》与《汉书》，《史记》的思想成就与文学成就，均超出《汉书》。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并非过分。《史记》之外，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一篇读之让人泪下的优秀散文之作，此篇被誉为《古文观止》的压卷。清代的李景星说：“司马迁生平事业，在于《史记》，而能概括《史记》全书者，惟叙传（指《太史公自叙》）一篇；司马氏平生伤心，在于受辱，而备载受辱由来者，惟《报任安书》一篇。得此二篇，而司马氏一生之本末具矣，此外虽多，皆不必言也。”（《汉书评议》卷四）《报任安书》看似“任意写去，而矫健磊落，笔力真如走蛟龙、挟风雨……卓为一代伟作。……胸中一段不平之气，触之而动，遂不觉言之长矣，而行文亦极纵横驰骋之至。王罕皆曰：满腔悲愤郁勃，

出之于激昂慷慨，文势纡回曲折，而首尾呼应。苏氏谓文疏宕有奇气，此篇是矣，自当与《离骚》抗衡千古。若杨惲之《报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其又具体而微者矣。”（李扶九原编、黄仁黼重订《古文笔法百篇》卷十五引孙月峰、王罕皆评）

汉赋发展到东汉，“体物而浏亮”的大赋，发展为抒情小赋，这是赋体散文的又一发展。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是其代表作。

建安时期，是社会大动乱的时代，又是文学独立自觉的时代。这时期的散文，呈现出新的特点。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说：“魏文与汉不同者，盖有四焉：书檄之文，骋词以张势，一也；论说之文，渐事校练名理，二也；奏疏之文，质直而屏华，三也；诗赋之文，益事华靡，多慷慨之音，四也。凡此四者，概与建安以前有异，此则研究者所当知也。”曹操是个尚通脱的人，其散文清峻通脱，质朴简约，《让县自明本志令》、《求贤令》、《整齐风俗令》等是其代表。曹丕以书札见长，清丽卓约，富有情韵，《与吴质书》、《与繁钦书》等，是其代表。曹植的文，抒情味最浓，且多有哀怨，辞藻之华美超过乃父乃兄，《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与吴季重书》、《与杨德祖书》等，是其章表、书札的代表作。值得一提的是曹植写下了数十篇的赋作，最为脍炙人口的《洛神赋》，塑造了一位美得无以复加的洛神形象，在文学史上发出熠熠的光彩。“建安七子”中的孔融，为文多寓讥刺，如《与曹公书》、《难曹公制酒禁书》等皆是其类。他作如《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则奋笔直书，辞锋刚劲犀利。陈琳的檄文最为出色，《为袁绍檄豫州》把曹操骂得狗血淋头；《檄

吴将校部曲》，铺张扬厉，先声夺人。王粲的《登楼赋》亦为感伤离乱、抒写思乡之情的佳作。七子之外，祢衡的《鹦鹉赋》，曹魏集团之外，诸葛亮的《出师表》，都是有影响的散文名篇。

魏晋之际，司马氏排斥异己，迫害文人，在政治与文化上实行高压政策，当时的文人有话不肯直说，这时的散文，一是论难散文，一是书序之类的散文。其内容或多玄理之辩，或多嫉世之辞，或超然物外。由于时世险恶，情多压抑，虽以老、庄为旨归，却不敢汪洋恣肆地放开去写，但阮籍、嵇康之文，还是比较使气骋辞、明快犀利的。阮籍的《大人先生论》惊世骇俗，发前人所未发；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名为书信，实际将矛头指向统治者，公然“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司马氏所提倡的名教相对抗，嵇康也因此获祸。向秀的《思旧赋》所以写得很短，是有话不敢直说所致。书序类中，李密《陈情表》，是一篇以真情动人的佳作。正如浦起龙所言：“层次说来，无一语不委婉动人，固是至性至情之文。而通体局势浑成，步骤安详，更极尽结构之妙。读者须细玩其词旨，及其转落承接，方不辜负作者苦心。”（《古文眉诠》卷四十一）

西晋的散文，骈偶化加强，建安时期的疏散之气渐失，其时的骈文已经臻于成熟。陆机可谓骈文的奠基者，他的《叹逝赋并序》、《吊魏武帝文》等，是当时骈文的典型。潘岳善于写哀悼之文，如《哀永逝文》、《马汧督诔》等，是其代表作。此外，刘琨的《答卢谡书》文介骈散之间，悲凉慷慨，自有清刚之气。

东晋的散文，王羲之与陶渊明二人取得较优异的成绩。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情景交融，记叙、议论、抒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句法整饬而兼有疏散，风格清新而兼有华采，笔意疏旷淡宕，渐近自然，如云气空濛，往来纸上。于苍凉感慨之中，寓有馀痛又兼有逸气。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和《归去来兮辞》，都是散文的佳作。特别是《归去来兮辞》，神思自然飘逸，词义潇洒，无一点风尘俗态，是一篇后人模拟不得的自然真率文字。

两晋散文的另一特点是题材的扩大与抒情写景的加强，这一特点更多地表现在赋中。如张华的《鹪鹩赋》是咏物见志之作，潘岳的《秋兴赋》、《闲居赋》是表现自己的生活情趣的。由于山水文学的兴起，出现了木华的《海赋》、郭璞的《江赋》和孙绰的《天台山赋》，这些作品的内容，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以抒情写景为内容的散文。

宋、齐、梁、陈四朝，是文学发生“新变”的时代，诗文的写作都很讲究形式技巧，重对偶、讲声韵、尚丽辞、喜用典成了这一时期的习尚。《文心雕龙·明诗》篇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诗歌如此，散文的领域亦复如此。骈偶文体，经过西晋至南朝，特别是齐永明年间之后，已完全定型而成熟。成熟的标志是四六对偶已成格局，骈四俪六，抽黄对白，已成为作家写骈文的自觉追求，所以骈文又称“四六文”，句式以四言六言为主，又稍加变化，参以三、五、杂言，使文章整饬而又错综，有参错变化、不板不枯之美。正如《文心雕龙》所言：“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章句》）其次是自觉追求音韵之美，将永明声律说，

运用于骈文的写作,使文学语言具有音乐性,诵读朗朗上口。复次,是隶事用典增多,出现了“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南齐书·文学传论》)的现象。在散文写作的形式技巧上,经过南朝作家的努力,较前代大大推进了一步。

南朝宋的骈文,成就最突出的是鲍照。鲍照的《芜城赋》向来被誉为六朝骈赋中的佳构,“驱迈苍凉之气,惊心动魄之辞,皆赋家之绝境。”(姚鼐《古文辞类纂·鲍明远〈芜城赋〉》)《登大雷岸与妹书》也是鲍照骈文中的优秀代表作,作者借写山川形胜,写出了自己胸中“负气争高”的激昂之气与“长图大念”。许琰说它“烟云变灭,尽态尽妍。即使李思训数月之功,亦恐画所难到”,“句句锤炼无渣滓,真是精绝”(《六朝文絮笺注》)。鲍照以后,差足与鲍照相颉颃的是江淹。江淹的《诣建平王上书》、《报袁叔明书》等篇,骈俪之中间以单行散语,不事秾艳,气格高出时辈。江淹的《恨赋》与《别赋》,对偶工稳,语言清丽简净,具有诗的韵味,是千古传诵的名篇。“通篇奇峭有韵,语法俱自千锤百炼中来,然却无痕迹。至分段叙事,慷慨激昂,读之英雄雪涕。”(许琰《六朝文絮笺注》)此外尚可称道者,还有一些写景的散文赋作。如谢惠连的《雪赋》,谢庄的《月赋》,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也都是传诵的名篇。刘峻的《辩命论》和《广绝交论》,是以骈体作议论的典范。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假山灵作檄,设想已奇。而篇中无语不新,有字必隽。层层敲入,愈入愈精。直觉泉石蒙羞,林壑增秽。读之令人赏心留盼,不能已也。”(《古文观止》卷七)这是一篇嬉笑怒骂的俳谐之文,在骈文中别具

一格。徐陵是南朝最后一位骈文家,《玉台新咏序》是其代表作。

北朝的散文总体来说成就不如南,北朝的“三才子”温子昇、邢邵、魏收,他们都写过骈文,其文风受南朝影响,但较少名篇,唯温子昇的《寒陵山寺碑》较为著名。北朝散文体的著作,向推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此三部书均有可选之篇章,《水经注》尤以写景见长,像《江水注·三峡》,是选家注目的名篇。

由南朝梁而被羁留北朝的庾信,集六朝文学之大成,用骈体赋抒写乡关之思,写下了《哀江南赋并序》。此文具有史诗般的规模和气魄,文采绮错纷呈,在用典上汇彼多方,屡变屡出,“援古证今”,“用人若己”(《文心雕龙·事类》),在散文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外《小园赋》、《枯树赋》等皆为优秀之文。

初唐的散文,骈体仍占优势,而且直接受六朝骈文的影响。王勃的《滕王阁序》和骆宾王的《讨武曌檄》都是骈体,而《滕王阁序》中千古传诵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乃从庾信《马射赋》“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化出,这就可见六朝骈文对初唐文影响之深了。盛唐时代的萧颖士与李华,被称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观萧作《伐樱桃树并序》和李著《吊古战场文》,仍是骈体。直到中唐时代,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兴起,才扭转了这一情况。唐代的古文运动,简言之有两个方面,即在内容上复兴儒学、儒道,在形式上反对骈文,提倡“古文”。所谓“古文”,指先秦两汉的散文。韩、柳在散文的创作实践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名篇佳制不胜枚举。韩之论说文

如《原道》、《原毁》、《师说》等，序传之属如《孟东野集序》、《毛颖传》等，哀祭之属如《祭十二郎文》等，都是名篇，《祭十二郎文》被称为祭文中的神品。柳宗元的论说文，既有皇皇大论的《封建论》，也有篇什短小的《桐叶封弟辨》及将叙事与议论融为一体的《捕蛇者说》，传记类的《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都颇具特色，而“永州八记”则是写景散文的佳作。但古文运动虽然取得成功，骈文并未销声匿迹，刘禹锡的《陋室铭》，骈偶之句颇多，杜牧的《阿房宫赋》，是典型的骈体文，李商隐等也有骈体之作。这说明骈文是很难骂倒的。

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了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用的是古文体，可以说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余绪。

五代至宋初，骈俪华艳之文再度抬头，宋初的柳开、王禹偁又开始提倡古文，其主张的核心是重道、致用、崇散、宗韩（韩愈）。王禹偁的《待漏院记》、《黄冈竹楼记》等是其崇散的代表作。柳、王去世之后，西昆体再度泛滥，范仲淹等人继续沿着柳开、王禹偁重道、致用、崇散、戒浮华的路子提倡古文，以革除西昆体之弊。范之名篇《岳阳楼记》，文中多用四字句，又杂以排偶，又注意藻饰，似散非散，似排非排，在形式上对唐代及宋初之古文来说，是有所突破的，所以被当时的古文家尹洙称为“传奇体”。

宋代复兴古文的运动，真正蔚为风气，成大气候，是从欧阳修开始的。欧公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从而带动了一支强大的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他们都是写古文的能手，可谓彬彬之盛，大备

于时。他们打着“文以明道”的大旗，取法韩愈的“文从字顺”、平易近人的语言风格，开创了新的散文体。像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文中以散文句式为主体，又杂以各种对偶句式，以散驭骈，骈散结合，错落有致，前人谓此文为赋体，有一定道理。此种文体，是欧阳修的创格。《秋声赋》与苏轼的《赤壁赋》，为“宋赋之最擅名者。”（李调元《赋话》卷五）苏轼是位能文的多面手，各体散文似乎都进行过尝试。在散文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的重要一家。他说谢民师的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其实他自己的散文创作也正是如此。王安石的散文，主要成就在议论文，像《伤仲永》这样将叙事、议论融于一体的散文，是其短篇中的佳作。

南宋的散文，由于国势日危、民族矛盾的高涨，出现了不少有爱国激情的散文。许多散文家，同时也是抗敌将领与爱国志士，陆游、辛弃疾、陈亮、叶适、文天祥等人，都有传世之作。比起北宋，南宋散文在形式技巧上也有所发展。同时，像陆游的《入蜀记》、《老学庵笔记》之类的笔记散文，也比过去多了起来。

明代的散文，明初当推宋濂、刘基二家。宋濂的散文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成就较高，如《记李歌》、《王冕传》，所写人物栩栩如生，各具个性。刘基的散文，体裁多样，内容丰富，尤以寓言体散文最为出色。《卖柑者言》，讽刺锋芒犀利，是明代寓言体散文不可多得的佳作。

明代中期以后，散文（也包括诗）的流派颇多，先后出现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茶陵派散文写作

成就就不大,前后七子都是主张复古的,提出“文必秦汉”的口号,认为西汉以后的文一概要不得,这种理论倾向当然是错误的,也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实践。

在明代的前后七子之间,嘉靖年间还形成了一个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唐宋派散文宗法唐宋八大家,不以秦汉古文为宗,主张文从字顺,反对诘屈聱牙,主张直抒胸臆,反对抄袭模拟,其基本理论主张是进步的,他们的创作成就也超过了前后七子,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归有光。他善于抒情、记事,能把琐屑之事委曲道出,不事雕琢而风味超然。《项脊轩志》可为代表。另外,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他们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模拟,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其创作实践成就颇高,尤以游记、尺牍、小品最有特色。晚明的张岱,在散文创作上也取得一定的成就,《陶庵梦忆》是其代表作。

清初的散文,首先转变晚明小品文狭小格局的是钱谦益。他合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为一手,形成规模宏大的清文风尚。其后之散文,大体分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两派。前者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他们都是具有民族意识的思想家,又是第一流的学者,其文均有大家风度,立论卓越,精光劲气,高过时人。文人之文,以清初“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为代表。清中叶以后,出现了以方苞、刘大櫆和姚鼐为代表的桐城古文派。桐城派讲究“义法”,“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又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标榜“道继程、朱之后,而文在欧、苏之间”。在思想上多“阐道翼教”之作,这一方面,很适合清代统治者

的需要。但他们能注意语言的“雅洁”，强调文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尚有可取之处。方苞的《狱中杂记》，姚鼐的《登泰山记》，是其优秀的代表作。其后，以恽敬、张惠言为代表的“阳湖派”，既崇奉唐宋文，又要求兼法秦汉六朝文，汇合骈、散两体文的长处，以救桐城派的单薄，其散文之作，亦有可取之处。而要求骈散结合，实际上弘扬的是我国散文的优良传统。

鸦片战争前夕，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是放眼世界的先驱者。他们的散文，在思想上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樊篱，形式上也有所变化，开创了近代散文的先河。

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帝国闭关锁国的时代已成过去，列强欲瓜分中国，企图将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时代危机日益严重。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文人，感到为现实所需要的，既不是桐城派古文，也不是阮元等所鼓吹的骈文，他们要求一种新体散文，这样资产阶级的新体散文就应运而生了。为了宣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他们要求语文合一，“我手写我口”，其代表人物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他们从古文或骈文的营垒中杀了出来，发起了“文界革命”。梁启超曾自言：“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清代学术概论》）这种“新文体”虽未完全摆脱古文的影响，但已为“五四”时代的白话文运动做好了准备，吹响了号角。

总之，中国的散文发展经历了曲折而漫长的过程，散文